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部落联盟与酋邦

——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

易建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出版人 轅壽光
出版者 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轅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7 号
邮政编码 轅 100013
网址 轅 <http://www.sanwen.com>
责任部门 轅编辑中心
项目经理 轅宋月华
责任编辑 轅章绍武
责任印制 轅同 非

总 经 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经 销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客户服务中心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转	廖元伊	廖毫米	员	转	廖元伊
印	张	转	廖元伊	廖毫米	员	转	廖元伊
字	数	转	廖元伊	廖毫米	员	转	廖元伊
版	次	转	廖元伊	廖毫米	员	转	廖元伊
印	次	转	廖元伊	廖毫米	员	转	廖元伊

书号 辕 陈 昇 苑 原 康 可 记 园 原 鼎 远 原 祥 泰 · 园 愿
定 价 辕 源 援 伍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前后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基金（1995年~199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995年~1996年）、国家人事部归国留学人员择优资助基金（1995年~1996年）的支持。此外，本书关于国外酋邦与社会演进理论的部分，主要来自于“十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1995年~1996年）笔者负责的一个专题《文明起源理论研究成果的整理》。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陈世远教授两次为笔者提供了赴荷兰进行研究的机（1995年 苑月至 1995年 员月与 1995年 员月至 1995年 缘月），阿姆斯特丹大学陈世远教授承担了笔者第一次访问的接待机构，阿姆斯特丹大学陈世远教授在笔者第二次访问期间，聘请了笔者作为它的研究员。在此谨对以上机构与相关人员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选没有他 们的支持，本课题研究不太可能顺利地进行。

本书出版还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祖母张菊香女士

(~~1935~~~~~1994~~)

序摇摇言

春天，清晨的阳光照在窗台。窗下树木间，几只麻雀在欢快地跳跃鸣叫。心绪却无阳光那般灿烂，许多事情，纠结缠绕，细细思量，虽是不着边际，轻曼缥缈，欲近还远，却总也剪不断，理还乱……

人的一生，实在做不了太多事情。文化大革命期间，初读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忧患现实，耻辱历史，令人百感交集，少年郎从此立下多少壮志。羞愤于近代中国人挨打的屈辱，迷惑于当时中国人穷而自相混战的创痛，第一个强烈的冲动便是，要知道，为什么会那样。这也是后来，我会选择学习历史的原因。开始钻入的是中国近代史，很快感觉，就事论事，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以为，应该从源头入手，便一头扎进先秦诸子中；捡拾虽丰，在关键地方，却是依旧一脸茫然。然后知道，这是一个比较研究的课题，需要探索的，决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本身。这样，又学到了外国古代的历史，学到了人类学。今天早上，终于于可以收拾起厚厚的一叠稿子，心情颇为复杂地，来为自己给未来工作的展开，刚刚劈开的一条不成样子的小路，着手做一篇小小的序言。“少年^①心事当拏云”，回首往事，豪气竟如昨日，窗外太阳依旧；心事未了，鬓毛已斑，怅望天际，直有伯玉先生“独怆然而涕下”之感。

^① 自然，古人所谓“少年”，与我这里所指年龄段，当有不同。此处勉强借用，还请读者“望文生义”，万万不可深究。

可以宽慰的是，中国早已经结束了那可以轻侮的混乱年代，走上了振兴的道路。1995年，我在波士顿举行的杜维明先生的一次讲演会中说到，大家都在谈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说明，虽然遍体鳞伤，步履蹒跚，中国这个巨人，还是终于走出了百多年来动辄挨打的泥淖，开始踏上了兴国之路；然而，21世纪是否一定会是中国的世纪，关键还是要看，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尤其是早晚将要进行的政治改革；过了这一关，21世纪肯定会是中国的世纪，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会彻底地洗刷干净鸦片战争以来的厚重耻辱，挺直腰，高昂头，扬眉吐气；只不过，万一过不了这一关，后果则不堪设想：要谈的将不会是，21世纪是否中国人世纪的问题，也许将会是，还有否一个完整中国的问题；因此，是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中国好好渡过这一关。静夜扪心自问，这么些年来，应该可以大胆地说，自己的话，自己一直未敢忘记；手下的这部稿子，勉强也可以算作一个注脚吧。固然，也常常会有迷惑的时候，常常会有，“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感慨。

当然，不管如何感慨，不管是谁人，总是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不仅使得国家从此开始强盛，也让我辈学人可以潜心研究。40多年来的中国变化，更给我们的探索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改革之前社会的停滞甚至倒退到改革之后社会的飞速发展，亲身的经历，让我们明白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长足进步的可能，关键的制度变化，在于打开了竞争的阀门。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都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制度化的竞争，包括制度化的政治的竞争与经济的竞争，是社会快速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反过来说，垄断的政治与经济，是缺乏大的社会进步推动力的政治与经济，是一种必然会逐渐腐败的政治，是一种没有大的发展潜力的十分脆弱的经济。这种观点倘若是正确的，那么，基于它来探索所谓中国

封建社会发展迟缓问题，很多从前让人困惑的地方，也许会豁然开朗。中国秦汉以来古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说到底，就是一种缺乏制度化竞争的政治与经济，就是一种以帝王为首的统治者垄断的政治与经济。垄断了政治权力的统治者，以政治的力量介入经济，在自己认为必要的地方，再实行经济上的垄断，其实质，就是他们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甚至于个人的私利，来尽可能全面地控制整个社会。

在垄断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下，垄断受益者的受益来自于垄断行为本身，他们不需要做出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努力，甚至于很多时候他们需要努力的是，阻碍社会的进步——只有社会停滞不前，他们才能够实行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垄断，他们才能够由此获益。其他社会成员尤其是垄断的直接受害者，就更没有必要为这围绕着垄断者利益运转的社会努力了。因此，实行垄断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社会，绝不会有大步发展的可能。在竞争的制度之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这种制度之下，只有优胜者才能够生存发展，故而，所有参与竞争者都不得不竭尽全力工作；竞争者的努力，最终汇成了推动社会长足发展的巨大动力。在竞争的政治制度之下，获取权力，掌握权力，使用权力，都需要相关者绞尽脑汁工作，提供最好的政治期许（并非那种虚无缥缈的乌托邦美梦）与产品，来博取权力授予者的同意与接受。所以，在这种制度之下，权力授予者不仅可以得到最好的政治服务，而且，权力本身就会促使权力不断优化，越来越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发展。竞争的经济制度，则逼迫每个参与竞争者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尽心竭力工作，以便拿出最能够为消费者接受的产品。他们的努力，也就是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努力，正是那些竞争经济制度之下推动社会大步发展的根本的经济动力，也是一个社会所可能产生出来的最大的经济动力。

差异还存在于两种政治制度对腐败进行监督的机制之上，

因而存在于作为其结果的两种社会腐败的广度与深度之上。制度化竞争的缺乏，也就是有效监督坚实基础与最为有效监督本身的缺乏，使得垄断政治制度无法防止腐败大面积滋生蔓延。故此，垄断政治制度本身有着一处致命伤，那就是腐败。没有制度上的竞争或者说牵制，政治必然会腐败，一步步走向全面腐败，以至于腐败最终将摧毁产生腐败的正在运转的政治机器本身，摧毁正在进行腐败的统治者自身。正是所谓，缺乏限制的权力，必然会腐败。说到底，垄断就是一种权力，并且是一种缺乏限制的权力，虽然也可以说，它是权力缺乏限制这一事实本身的一种表现。还需要强调的是，理论上并且制度上受到限制的权力，同样也会大面积地腐败，如果政治制度本身排除了制度化的竞争。制度化的政治竞争，是有效限制的坚实基础，其本身，更是对权力的一种最为有效的制衡机制，有了它的存在，社会才可以防止权力大规模腐败。合法的权力竞争者实行的监督，是对权力掌握者实行的最为有效的监督。这种监督，正是他们竞取权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不用任何督促，权力竞争者自然而然会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在垄断的政治制度之下，除了对最高权力之外，理论上也有对权力进行的监督。不过那是一种十分软弱无力的监督。监督者所可能获得的奖励与惩罚，并不一定依赖于他们是否对滥用权力进行腐败者实行了有效的监督。很多时候，如果他们要实行认真的监督，就有可能丧失自己的权力，甚至丧失自己的身家性命。反过来，如果他们对腐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则往往可以分享到腐败的利益，甚至获得更大的权力。他们的权力之得失，利益之得失，不在于是否实行了有效的监督，而是在于，是否能够博取相关权力更大者（有的时候正是他们监督的腐败进行者）的宠信。在这种社会之中，尤其不能不提到的是，最高权力的腐败，是无人能够进行有效的合法监督的；甚至，受到最高权力宠信的人，只因为受到了这种宠信，同样也有可能不受监督，即便

他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奴隶。因而，我们看到，垄断政治的专制社会最大的腐败案例，往往都是和最高权力相关联的。

政治上的垄断，必然导向经济上的垄断。全面的政治垄断，意味着权力的全面专制化，它的一种必然表现就是，全面的经济垄断，或者至少可以说，在客观条件允许情况之下的，在统治者认为必要地方的，尽可能广而深的经济垄断。而垄断的经济，在好的情况之下，在风调雨顺而统治者又相对能干并且不那么贪婪的情况之下，也只是一种能够勉强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经济，不会有推动社会大步发展的力量。

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社会，在一个朝代开始几个皇帝统治的时期，我们有的时候会见到，经济上呈现一种史书所称赞的繁荣景象。其实，在这种所谓的“太平盛世”之下，老百姓也就是能够维持温饱而已，政府有财力来进行正常的运转而已。这种所谓“盛世”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建立新朝代的统治者，都是战争（人类社会非制度化的非常形式的竞争）的胜利者，在摧毁了前代腐败到腐朽的统治机器之后，在扫除了前代一些造成社会动荡的其他因素之后，他们能够将自己以前用于战争的有效的组织力量，用来重建政府；他们基于一种建立长久统治的考量，能够接受前代一些导致灭亡因素的教训，在各个社会集团之间，重新进行更为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利益分配；新的政治腐败，在能干的最高统治者的压制与自我克制之下，在新的政府机器之中，还只是零零星星地出现，还不至于严重到妨碍整个制度的正常运转。当然，结束了战争，时代既是“太平”，内忧外患暂时地告一段落，也为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但是，需要记住的是，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是一种垄断的制度，是一种不仅压制政治竞争的制度，而且必然也会是一种统治者在认为必要的地方合法不合法地压制经济竞争的制度，因此，它是一种在政治上必然会走向腐败的制度，一种在经

济上无法长足发展至多只能自保的脆弱制度。

在垄断的政治制度之下，也就是在专制的政治制度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腐败会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腐败不仅仅很容易会出现在一般官员身上，而且同样很容易会出现在大的官员身上，出现在最高统治者及其家族成员身上。在这种制度之下，权力掌握者进行腐败的机会很大，而由于缺乏基于制度化竞争之上的监督，包括最为有效的合法权力竞争者的监督，腐败者受到查处的几率又很小，这对于那些大权在握者来说尤其是如此，因此，谁掌握了权力，谁都很难抗拒腐败的诱惑。更需要强调的是，权力越大，进行越大腐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最高权力拥有者的腐败行为，常常掩盖在国家的合法名义之下罢了。清末慈禧太后为自己寿庆，移用海军银两重建颐和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到，许多有组织集团的腐败行为，也往往是打着国家机构旗号明目张胆地进行的，也就是说，在专制国家的合法名义掩盖之下进行的。

随着政治腐败的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缓至速，专制政治或者说垄断政治之下垄断经济的脆弱性，逐渐地就会表现出来，使得政府越来越没有能力，尤其是财力，来对付天灾与外患。而天灾与外患，却使得统治者更有合法的借口，加紧加重压榨百姓。对于百姓来说，雪上加霜的是，腐败的官员与帝王及其家族成员，更会借着对付天灾与外患的机会，加紧加重牟取私利。结果是民不聊生，奋而为生存而反抗。结果是改朝换代。典型的例子，仍然可以举出刚刚提到的清末。慈禧的做法，以及官吏们的腐败行为，导致海军装备不足，甚至有的方面装备低劣，最终成为后来甲午海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甲午战争失败，割地赔款，不仅仅本身是中国一个大的耻辱和灾祸，而且更加引发列强胃口，日俄英法德美等等，都加速了吞食这个古老国家的行动，

中华民族的灾难，于是一个一个接踵而至。已经全面腐败^①的满清政府，捉襟见肘，无法应对，只有加紧加重压榨百姓，讨好列强，用叶赫那拉氏的话来说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再加上大小官员上下其手，从中牟取私利。百姓无法生存，最终只有推翻清朝政府。

当然，我们知道，这次这个朝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灾难的立即结束，接下来并未立即出现一个“太平盛世”。内忧外患并未消除，最高权力却是已经软化，有的时候甚至出现了真空，内战外战于是愈演愈烈，老百姓的苦难于是愈益深重。不过，依旧应该可以庆幸的是，当时中国外部的环境，已经不同于清朝的前代了，来自于“胡夷”的思想，已经在中国人中间，形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发展的契机，一束将要打破中国垄断制度传统天空的曙光，一个将要让中国走出两千多年发展迟缓怪圈的巨大希望，已经若隐若现了。虽然，非垄断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能够保证充分竞争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多灾多难的过程。

回到清朝以前的朝代，兴盛衰败历程的曲线变化大致都相同，时代环境的不一样，却使得结局有着一个重要的差异。以前的改朝换代，完全只是换汤不换药，换来换去，不换的是那种压制政治竞争与经济竞争的专制制度。于是，每次推翻了前代的统治者，一次又一次地开始重复，这种当今研究者已经十分熟悉的，所谓中国古代历史的周期。朝代是换了，皇帝改成别家姓了，压制竞争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却没有变化，社会却没有大步的发展。

^① 此处“腐败”一词，正如别的一些地方的一样，都可以换成“腐烂”，它包括但是又不仅仅指通常意义上权力掌握者非法牟取经济私利行为的那种“腐败”。

因此，我们说，学术上所谓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压制政治竞争与经济竞争的专制制度，就在于这种垄断的制度。^①

解释中国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多年的社会发展迟缓，解释对比研究中这个时段欧洲许多社会的相对快速变化，有人使用人种的差异，有人使用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差异，有人使用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差异，有人使用灌溉文明与雨水文明的差异，有人使用单一经济结构与多元经济结构的差异，有人使用封建化程度的差异，有人使用超稳定系统与非超稳定系统的差异，有人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日耳曼生产方式的差异，有人使用其他什么名目的土地制度奴役剥削制度农村公社制度的差异，等等等等，学术史上，仁者智者，见仁见智，争论了一代又一代。我们的解释是，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重复一遍，都是一种压制政治竞争与经济竞争的垄断的专制社会，因而必然是一种发展迟缓的社会；欧洲的许多社会，无论是从外部环境看，还是从内部机制看，从两千多年的长时段角度来观察，总体上可以说，都是一种多元化的竞争的社会；比较中国社会来看，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的许多社会，政治上实行的，多是一种非专制的制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因而是可以推动社会长足进步的经济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之下，方有可能得到大步发展的机会。专制制度压制政治的竞争与经济的竞争，社会因而发展迟缓；非专制制度尤其是其中的民主制度容许甚至鼓励政治的竞争与经济的竞争，社会一有机会，就会大步发展。这就是首先由于中国社会与欧洲许多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而造成其次的经济制度的不同，所必然导致的社

① 当然，说专制政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这并非是我们首倡的观点，许多学者对此都做过了论述，比如，可以参见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146页。我们看法不同的地方在于强调，专制制度的实质与表现都是垄断，而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垄断，必然造成社会发展的迟缓。

会发展速度的不同。

看来，我们的解释，是不十分相合于中国学术传统坚持的，经济决定政治的基本理论。在这么多年的历史研究与现实体验中，我们无时不在深切地感触到，政治权力的巨大。在我们看来，人类社会政治权力的结构，实在足以决定经济制度的结构。退一步讲，至少在我们研究的范围之内，应该可以认为，更多的时候，是政治制度决定了经济制度，而不是相反。当然，我们不是在这里说，只有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任何时间与空间，都没有相反的情况发生。我们更知道，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都不会是与经济制度没有关系的；尤其是，在某种经济制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相应政治制度的建立，就会成为一种不易阻挡的社会要求。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解释，从一个长时间段来看，尤其是，从我们研究的时段来看，在某种政治制度之下，为何只存在着某种经济制度的原因。仅仅使用传统理论，是不太容易对此做出令人满意回答的。

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先不讨论谁决定谁的问题，我们知道，至少应该承认，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尤其知道，经济的力量，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政治权力的最为重要的基础之一；经济的利益，是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在追求的一种根本的利益，政治权力掌握者自然也不会例外。只是，正因为政治权力掌握者都清楚地知道，经济的力量与自己的经济利益，故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尤其是在认为不会损害自己权力的时候，他们决不会轻易放弃机会，利用手中权力，来影响经济制度的变化，使其为自己服务。专制统治者，垄断了政治权力，没有制度上的合法的政治竞争者，也就是说，没有制度上的合法的权力牵制者，更是会水到渠成地，顺理成章地，甚至可以说，天经地义地，利用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来压制经济利益上的竞争者，使得这种社会的经济制度，在统治者认为必要的方面，在客观条件许可的

方面，成为一种所谓“国家”垄断实即自己垄断的经济制度。在非专制的政治制度之下，政治权力掌握者同样也会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样也会利用手中权力，来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服务，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像专制统治者那样，想做什么就差不多可以做什么了。在这种政治制度之下，政治权力掌握在合法的相互竞争因而相互牵制的几股力量手中，谁也无法单独利用权力，长时间不受限制地干预经济事务，使得经济制度成为一种单方向倒向自己的垄断的制度。固然，如果有机会，如果有可能，这种政治制度之下的权力掌握者，与专制政治制度之下的权力掌握者一样，也会利用手中权力，采取各种方法，使经济制度朝着有利于自己私利的方向发展。他们许多时候没有那样做，从表面上看去，似乎是因为并不想那样做；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知道做不到，做了就会损害自己的权力，故而没有去那样做。当然，也有许多时候他们那样做了，但是由于竞争者的牵制，他们没有做到。正是所谓，“非不欲也，实不能也”。只不过，恰恰因为有了这种“不能”，竞争的经济制度的长足发展，才有了“可能”。故此，我们说，竞争的经济制度，从一个长时间段来看，也只有在一種政治上多元化的非专制的权力结构之内，才有可能得到大步发展的机会。

垄断的经济制度，从短时间段来看，从表面上来看，是直接地增强了统治者手中垄断的政治权力的，但是，从长时间段来看，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低效率的脆弱的经济制度，最终会无力维持统治者手中的政治权力。竞争的经济制度，则拥有充分的潜力，来巩固非专制的政治制度，来推动它的发展完善。多元化的竞争的经济制度，多元化的竞争的政治制度，它们之间才真正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落实到今天，换句话说这就是，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竞争的民主政治制度，它们才是真正相互成为基础，相互促进，相互完善的。自然，在这个问题上，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坚持我们的主要观点，所谓，在更多的时候，

“人类社会政治权力的结构，实在足以决定经济制度的结构”，即便也有相反的情况发生。我们仍然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多数时期，都是先有了竞争的政治制度，方使得竞争的经济制度，得到了机会长足发展；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它们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尤其是，竞争的经济制度一旦得到了发展，也会必然要求相应的竞争的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政治的力量更为直接，更为迅速，经济的力量相对来得间接而缓慢，因而，政治的力量可以直接地、迅速地改变经济制度，经济的力量如果要改变政治制度，则要经历一个十分缓慢的艰难的过程。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情况常常是，专制政治的最高权力掌握者，可以迅速地将竞争的经济制度，转变成为垄断的经济制度，而竞争的经济制度，改变专制的政治权力结构，则要经历一个十分漫长的往往反复的艰难过程。我们也知道，历史上发生的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专制政治的最高权力掌握者，往往是比较明智的专制统治者，在某种历史条件之下，尤其是在外力的影响或者不如说是迫使之下，将垄断的经济制度，转变成为竞争的经济制度。比较专制统治者，将竞争的经济制度，转变成为垄断的经济制度那一种情况，这一种转变就是比较缓慢与艰难的了，原由在于，垄断的专制政治权力掌握者，因了自己集团甚至个人的利益，必然倾向于垄断的经济制度，故此，纵然迫于形势或者外力，不得不实行这种转变，统治者的内心也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态度也往往是犹豫不决的，行为由此会时时捉摸不定，政策随之也就屡屡反复无常。总之，放弃垄断的经济制度，是违背专制政治权力掌握者的本性的，因而，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如果没有外来的影响，或者说外来的压力，这种转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也极少见到，即便是在外来影响甚至压力之下，专制统治者主动将垄断的经济制度改变成为竞争的经济制度这种情况发生。即便如此，比较一下竞争的经济制度改变垄断的政治制

度那种情况，专制政治的最高权力掌握者，倘若足够明智与坚决，将垄断的经济制度，改变成为竞争的经济制度，需要的时间也是相对短暂的。这原因当然也在于前面说过的，政治力量本身的直接与迅速。虽然，我们知道，即便统治者足够明智与坚决，由于专制政治权力掌握者本性的缘故，这种改变也很难会是彻底的。

在专制的政治制度之下，统治者将竞争的经济制度转变成为垄断的经济制度，或者相反，将垄断的经济制度转变成为竞争的经济制度，两种转变速度不一难易不同的原因还在于，垄断政治制度之下权力掌握者们的腐败行为。将竞争的经济制度转变成为垄断的经济制度，对于这种转变而言，腐败行为是顺水推舟；反之，腐败行为则是逆流了。

我们还有必要提到的是，除了经济力量本身的间接与缓慢之外，竞争的经济制度改变垄断的政治制度的一大困难另外在于，这种改变直接威胁到绝大多数权力掌握者的权力本身，何况，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有腐败行为，以及其他的违法行为，包括严重的犯罪行为，这种改变由此也就意味着，这些人不仅仅有可能要损失甚至丧失权力，并且还有可能会受到改变之后的竞争的政治制度之下的法律的惩罚，故而，政治制度的变革，必然会引起他们各种形式的反抗，较之在经济变革领域，范围更为广泛，态度更为坚决，程度更为激烈。这也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一些专制国家在实行了竞争的经济制度的变革之后，再实行能够促进社会长足发展的充分竞争的经济制度所必然要求的竞争的政治制度的改革，会是那么艰难而缓慢。不过，艰难是艰难，缓慢是缓慢，最高统治者如果有决心，有能力，先推行经济制度的改革，随着改革后经济制度的巩固与发展，应其要求，借其力量，顺水推舟，再实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在变革时期，也许更为容易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更有可能减轻变革引起利益重新分配所导致的难以避免的社会动荡。

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谁决定谁的基本理论问题，绝不是这里简短的讨论所能够说得透彻的，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将进行它们之间关系的探索。不过，即便暂且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我们知道，前面关于中国与欧洲许多社会发展速度差异原因的解釋，还仅仅是第一步。可以想像，大家还会进一步问到，在中国，朝代可以变，皇族可以换，压制竞争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为何却可以延续两千多年，并无替代，欧洲的许多国家，在同时段里，则可以不断地经历各种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变化？换句话说，问题到了这里，大家应该接着会问，政治制度的不同，必然导致经济制度的不同从而导致社会发展速度的不同，这一点即便是对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秦汉以来直至明清的古代中国，会一直实行压制政治竞争的专制制度，从而实行压制经济竞争的所谓“国家”垄断经济制度，实即统治者垄断经济制度，从而社会发展速度相对迟缓，而在这相同的两千多年中，欧洲的许多国家，会实行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包括非专制制度尤其是其中的民主制度，从而竞争的经济制度或者说市场经济制度，有可能得到机会长足发展，从而社会有可能变化相对迅速？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是中国世界史学科传统上所谓的古代，因而，秦汉与西罗马帝国时代以后的中国与欧洲社会发展速度差异的原因，并不直接地属于本书的研究任务。不过，我们大胆地以为，自己对包括秦汉与罗马帝国及其以前时代人类社会权力结构差异原因的基本解释，也可以用于秦汉与罗马帝国时代以来直至近代甚至当代的中国与欧洲各个社会政治制度差异原因问题，这尤其是在本书的结束部分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这种推论的确有些冒险，虽然，令人信服的解释，还需要以后更多的专门工作。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恳请读者，稍微多花费些精力，仔细一点阅读本书的最后一章。在这里，我们就不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了，只是简单地，公式性地，先来列出本书在古代社会权力结构形成发展差异原因上的主要观点：